



上圖為張國燾晚年的照相

細說張國燾(一)

費雲文

前言

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開創人之一，是中共黨徒唯一見到列寧的人；他在中共曾經擔任過很多重要的職務，有過艱苦奮鬥的史實；也是與毛澤東發生衝突，一再遭受侮辱鬥爭，始終不屈，最後毅然出走脫離中共，而敢於公開發表言論，指斥中共政治路線錯誤的一人。同時，也是中共高級人員中，晚年能享受天倫之樂，安靜去世的一人。一生的事蹟，貫穿中國近代時事，有很多不為人所習知或者為人傳聞所誤的隱秘事實，極具充實近代史料的價值。而其與毛澤東的衝突分裂，以及受到史達林生命威脅的經過，種種祕辛，也極具警惕教訓的意義。

另外，張國燾來歸以後，有人以為國民黨未能善加運用他，利用他在中共的地位與關係，從事分化中共、打擊中共的活動；也有人以為未能給他很高的職位讓他發揮所長，報效國家，以廣

招徠。這些想法是有問題的。

首先，張國燾之脫離中共出走來歸，自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；但他並不是反對馬、列共產主義，並不是反對中共組織。而在他到達武漢之初，即曾間接的向蔣委員長表示，他不願担任任何黨政職務；同時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往往存有一種猜忌心理：「我在國民黨人眼中，是身家不清白的人」，而對我黨政措施，仍存有：「獨裁專政」的偏頗成見。再說，國民黨與我中央政府對他，曾經給他好幾次超然清高地位的服務機會，也由於他的消極情緒和倔強個性，落個有始無終。最後，當他晚年在加拿大多倫多老人病院養病時，我政府仍然雪中送炭的送一筆醫藥費給他。國民黨對他，可算是仁至義盡了。

其中經過曲折，確有分析敘述，公諸大眾的必要。茲就筆者四十年來研究中共問題所認知的有關資料，參證張國燾自己的回憶，和一些鮮有

世人所知的掌故，對張國燾的一生，作一客觀的介紹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愛國青年學生要人

張國燾，別名張特立，一八九七年（光緒廿三年）出生于江西萍鄉縣北鄉的上栗市，距縣城八十里；但西面距離湖南的瀏陽、醴陵的邊界，都不超過廿里；所以風俗習慣上接近湖南，歷代相傳，多為讀書人，各房都有田地；他父親還是滿清最後一屆的拔貢生，可以說是個鄉紳之家。

由於中山先生所發動的「丙午萍瀏之役」，上栗市就是一個重要的據點；同時，萍鄉也是革命黨人經常活動的地區。當他就讀萍鄉縣立小學時，又從少數親友和教員中，得到些維新變法和革命排滿的消息；所以他成爲一個革命同情者。就讀萍鄉中學時，曾經在國民黨二次革命反袁世凱之役中，幫助一個叫「陳矮子」的黨人，祕密搬運違禁物品，接送人員。民國四（一九一五）

年一月，日本政府，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密約的消息被揭露。他已轉學南昌心遠中學，風氣比較萍鄉更為開通，於是，經常閱讀報刊，留心時事。逐漸「關心國事」的熱忱，超過了「追求科學知識」的願望，終於使他成爲一個狂熱的愛國者。

民國五(一九一六)年秋天，他由上海北上北京，入北京大學爲理工預科一年生。最初埋頭讀書，成績優良，次年春，陳獨秀任北大文學院院長，創辦「新青年」刊物，在胡適之等人的呼應下，發起了「新文化運動」，引起一場「新舊文學」的大論戰。他受到很大衝擊，不甘落伍，自命爲力求上進的時代青年；不但熱烈擁護陳、胡的立場，而且常與反對者展開爭論；甚至還把一些宣傳新思潮的書刊，寄回家鄉給他父親看。

歐戰結束，他和北大圖書館的李大劍來往密切，因而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；並且和鄧中夏、羅章龍等同學，組成「平民教育會」，標榜社會改造，應從平民教育入手。五四運動，他被推選爲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，領導各學生講演團，從事提倡國貨，抵制日貨，組織民衆團體，發行傳單報刊等活動。由於講演團毫無顧忌的攻擊北京政府和親日派，造成人心憤慨的情勢；北京政府在日本的外交壓力之下，積極嚴禁學生講演和抵制日貨等活動。六月二日，他主持的講演部通過決議，不理會北京政府禁令，恢復並擴大講演活動。當他和十幾位同仁到達天安門一帶向羣衆講演時，與警察發生衝突，他們被捕了。

愛國學生被捕，引起各方面公憤，三、四兩天，北京各校學生，幾乎全部出動，恢復露天講

演，北京的軍警，惱羞成怒之下，竟然逮捕了上千名的學生。這種狂妄的高壓手段，激動了全國，各大城市相繼罷課、罷工、罷市，以示抗議，終於迫使北京政府讓步，釋放被捕學生，罷免親日官吏，最後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在各方面輿論的壓力之下，也在六月廿八日正式向巴黎和會，表示拒絕簽字。

民國八(一九一九)年七月，陳獨秀和「北京學生聯合會」的十一位重要負責人魯士毅等先後被捕，當時，正是暑假時期，多數學生已離校返家，而抓去的也僅是北大的師生，無法再像「五四」一樣的，發動大規模的運動。張國燾被推舉爲「學生聯合會」的主席，設法處理此事，他和北平各校校長、教職員和學生取得聯絡，大家採取同一步驟。八月底，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偵查終結，正式開庭審訊。「學生聯合會」發動了一千多學生，於開庭當天去旁聽，滿佈法庭內外；實際向法院示威，反對當局非法拘禁學生達兩月之久，要求立即釋放。終於使審判長當庭宣告各被告無罪開釋。

十月，北大開學，他辭去學生會的一切職務，參加一個以「無政府主義思想」爲基礎的「嚶園」組織，以互助、共同生活、親自勞動爲宗旨。由於他非常賣力，被同仁戲稱爲「學生要人」。這時他感覺到才廿二歲，還應當努力完成大學學業，爲自己的前程打基礎。

可是，十二月的某一天，警察又到「嚶園」去逮捕正在廚房燒飯的他。幸而他以機警的掩飾，逃過了這一關。事已如此，他祇好悄悄的離開

北京，前往上海。在上海，他和國民黨的要員胡漢民、汪精衛、朱執信、廖仲凱、戴季陶、葉楚傖等常有過從，並且曾經兩度晉見孫中山先生。他對孫先生的雍容大度和精深學識非常佩服，認爲孫先生確是一位值得敬佩的、坦誠的大政治家。民國九年(一九二〇年)五月，爲了完成北大學業，他又回到北京。

南北奔走創組共黨

先是民國八(一九一九)年七月廿五日，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，表示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權，取消庚子賠款，歸還中東鐵路，高唱「無割地、無賠償的和平」，消息傳來北京以後，立即爲學生界和文化團體所歡迎；對蘇俄有了好感。

李大劍本來是北京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人物，他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，已成爲左傾思想的發祥地，自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後，他更常以俄國革命作爲談助。

張國燾回到北京，第二天就去見李大劍，商談之下，認爲當前救國的途徑，祇有效法蘇俄；而蘇俄革命其所以成功，得力於俄共的領導。一切問題，必須先從了解馬克思主義着手。於是，他在李大劍的啓發下，開始有系統的研究馬克思主義。當時，他和李大劍祇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；但都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，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。祇主張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，暫不實際過問政治。

上海方面，共產國際東方支部長胡定康(Gregori Yousky)已經來華與陳獨秀取得聯絡，積極籌組中國共產黨；已獲得李漢俊、李達、

陳望道、沈定一、邵力子、施存統等人的贊助。陳獨秀曾經寫信給李大劍，主張採取實際行動，大幹一場。

七月初，北京局勢緊張，直皖戰爭一觸即發，爲了避免親日派的壓迫學生領袖，同時也爲組織中共問題，和陳獨秀商討；張國燾在李大劍的促使下，再度離京南下上海。在上海，他住在陳獨秀家中兩個星期，普遍討論組織黨問題，由於他們對馬克思所說「工人無祖國」，尙不能接受，對「無產階級革命」與「民族獨立革命」、「民主革命」之間的關係，尙不够明瞭；於是不主張先發表「共產黨宣言」，甚至連黨綱和政綱，也應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作決定。

陳獨秀認爲最重要的是展開各項實際工作，應當先在各重要地方組成中共小組；立即開始宣傳、組織工作。特別着重於重新組織工會，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，吸收先進工人做黨員；同時選用各種形式來組織更廣泛的青年，讓他們參加多方面的工作；利用知識婦女，發動組織廣大婦女羣衆。

陳獨秀很急於在各地發動中共小組的事，除了上海以及蘇、浙、皖一帶，由他自己負責外；他希望李大劍和張國燾從速在北方發動，先組織北京小組，再向山東、山西、河南等省和天津、唐山等地發展。因此，張國燾乃於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年）八月底，再回北京。

在李大劍的贊成支持之下，中共的北京小組，于九月中旬開會成立，十一月底，正式命名爲「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」李大劍爲書記；張國燾

擔任組織工作，指導職工運動；羅章龍擔任宣傳工作，主編「勞動者週刊」，共有黨員十五人。另外有相關機構：「社會主義青年團」，約四十人，大都爲北大同學；由高尙德爲書記；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」，由李大劍負責。

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七月一日，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，共出席代表十三人（當時黨員五十九人，另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約三百五十人），張國燾代表北京支部，被推爲大會主席，（因爲主要負責人陳獨秀在廣東，未能出席大會，）並且修正通過了他所草擬的黨綱、政綱草案。大會推舉陳獨秀（書記）張國燾（組織）李達（宣傳）爲執行委員，組成「中共中央」。

赴莫斯科晉見列寧

職工運動，是中共認爲最重要的工作，張國燾就是最先發動的人。距離北京廿一公里，有一個京漢鐵路的車站「長辛店」，因爲設有修車廠，所以有一千多工人。五四運動時，張國燾曾經前往講演，並且發展十人團的組織，與當地工人有一段和善的淵源關係。

當民國九（一九二〇）年九月，「北京小組」正式成立後的第三天，張國燾就去長辛店，進行職工運動；先從適應工人需要着手。很快的租到一所房子，籌措一點經費，創辦一所工人子弟學校，白天教育工人子弟，晚上幫工人補習，不收費用，由「社會主義青年團」的團員李實當教員，姓武的天主教徒辦雜務。他本人每週由北京前往一次，住一晚；晚上對工人演講，鼓勵工人如何改良生活，組織工會。

由於學校辦得不錯，人數不斷增加，於是改名爲「長辛店勞動勤務補習學校」，漸漸的成爲調解糾紛的仲裁場所，代寫家書文件，顧問醫藥的服務處。張國燾每週一次的個人活動，也擴大到常去工人住所訪問；勸導他們應當建立屬於自己的組織。終於在民國十（一九二一）年五月，正式成立「工人俱樂部」，通過章程，選舉職員，成爲中共在工人羣衆中建立的第一個陣地。

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，張國燾以中央組織部長的身份，在上海籌組一個組織工人運動的中央機構：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，規定在上海設立總部，除指導全國工運外，並且兼辦上海區的工運工作，創辦「勞動週刊」；另在北京、武漢、廣州、長沙等地設立分部，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。

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於九月正式成立，張國燾被推舉爲上海總部主任，李啓漢爲祕書，北方分部由鄧中夏、羅章龍負責；武漢爲林育南、項英；湖南爲毛澤東；廣州爲譚平山。十月，張國燾又被推選爲出席「遠東勞苦人民大會」的中共代表，第一次前往蘇俄。中國除了中共以外，尙有其他各方面的代表，大會決議組成代表團，推舉張國燾爲代表團主席。

大會原擬在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斯克召開，後來改在莫斯科。當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一月廿一日開會時，張國燾被推舉爲十八個主席之一。並且和代表國民黨的張秋白，代表鐵路工人的鄧培，一同應約去見列寧。

這次俄國之行，使他產生一種基本上的觀感

：他贊成武裝革命，也佩服俄共組織的健全和革命後的若干措施；但覺得俄國革命過份依賴暴力，與中國革命傳統不合；尤其對無止境的鬥爭，發生反感。（這與他後來脫離中共有很大影響）

張國燾由蘇俄返國後，爲了確立中共在工人羣衆中的領導地位，蓬勃職工運動；由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發起，于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年五月一日，在廣州召開「全國勞動大會」，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，代表一百一十幾個工會，工人廿萬人；大部份來自香港、廣東。由張國燾宣佈開會，譚平山、鄧培、黃煥庭、林偉民、謝英伯爲主席團；而以譚平山執行主席職務。張國燾因爲不通粵語，從幕後加以策動，草擬大部份的決議案交付通過。當經決定在全國總工會尚未組成以前，委托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」爲各地工會的總通訊處；負責召集「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」。因此，中共開始從實質上獲得了全國職工運動的領導地位。雖然，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表面上並不帶共產色彩，在上海已合法存在。可是，由於他曾經支持香港海員罷工，此次又負責召集全國勞動大會，成爲全國工會的總通訊機關，於是引起公共租界當局的嫉視而于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年九月，封閉該「書記部」及其出版的「勞動週刊」，捕去秘書李啓漢，判處三月徒刑後，驅逐出境。於是「書記部」祇好遷往北京，由鄧中夏接替主任；張國燾則因「中共中央」書記陳獨秀出國，暫代其職務。

當時，吳佩孚於戰勝奉系以後，通電保護勞工，北方與兩湖地區，工會可以公開組織，罷工

可以公開進行；工人運動，正是欣欣向榮時期。吳佩孚且會要求李大釗，介紹六個共產黨員給交通部（部長高恩洪爲吳的親信），分任各重要鐵道的密查員，考察各路的積弊；用以排除盤據鐵路上的梁士詒的交通系勢力，以便因此接管鐵路財務，增加財源。可是，中共的幹部，却把吳佩孚交付的任務置於不顧，反而藉此掩護，大幅度推展其純粹的職工運動。從此，各地工會組織和參加人數大爲增加，罷工運動也風起雲湧。於是，惱怒了吳佩孚，引發一場鎮壓工運的大風暴。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年二月一日，中共在鄭州舉行「京漢鐵路總工會」的代表大會，準備正式成立「京漢鐵路總工會」。張國燾奉派前往指導。鄭州工人列隊遊行，慶祝總工會成立。却遭受吳佩孚的下令取締。工人與軍警發生衝突。由於軍警拒絕任何緩衝和解決方式，引起沿鐵路線工人的憤怒，實施以武漢爲重點的大罷工。七日，湖北督軍蕭耀南下令以屠殺方式對付罷工，當

天就殺了卅七人，逮捕八十餘人。並且把拒絕下令復工的林祥謙等四個工會負責人斬首示衆。張國燾看到事態嚴重，爲了減少犧牲，保存實力，以圖再舉，他力排衆議的主張「應當退却時，就應迅速退却」；下令各地立即復工，平息了一場風波；他個人于二月十二日潛回北京。

北方，長辛店一帶的工會組織，以及各站的「工人子弟學校」、「工人補習學校」、「工人俱樂部」等機構，都遭到封閉；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」所創辦的「勞動週刊」也被禁止發行。中共的職工運動，受此嚴重打擊，除了湖南地區尚有少數組織繼續活動外；其餘幾已大部被摧殘。因此，包括張國燾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物，已認清工人罷工，並不能抵抗軍閥的武力，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對抗軍閥的武力；因而對國民黨在廣州建立革命武力，擴大革命基地的做法，寄予很大的期望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戴笠的一生

費雲文 著
全一冊定價一百二十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傳記，要目：
 ①戴笠其人其事
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
 ③戴笠與中美合作所
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
 ⑤戴笠與雷鳴遠
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
 ⑦戴笠與鄭介民
 ⑧戴笠鋤奸記
 ⑨戴笠與毛人鳳
 ⑩戴笠生平事跡簡表
 附戴笠手蹟及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叁百三十餘頁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穿線平裝訂價一百二十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